

崔東壁集新序

許嘯天

前題。
從來說的「盡信書不如無書」又說「學以致用。」這是我們做學問的必要明瞭的兩個大

我如今先說「盡信書不如無書」是什麼：

打開我們中國數千年來所謂漢儒宋儒明儒的著作，開口稱「六經」，閉口稱「六經」。直到現在，一班自命爲學問家的，也是提起是「經史之學」，放下是「國故之學」，好似六經便是人生的衣食飯盤，國故之學便是擋箭牌。什麼工商實業，都可以不問；什麼堅船利砲，都可以不怕。一班中國的領袖人物，死抱住他食而不化的六經國故之學，眼盡蒼生！眼看着別人的經濟勢力，壓迫着我們，漸漸的成了枯魚；又坐着外國的堅船利砲，欺凌着我們，活活的做了賤奴！這種種眼前的大禍，豈是他們所說的六經和國故學所能挽救的麼？還是要別求途徑來救我們中國呢？

據我說來，救中國固然要別求途徑；但這途徑，却還是要向「六經」「國故學」中去尋。這是

怎麼說呢？

須知道，治理一個國家，固然要適合時代精神，採取全世界最妥善的方法去應用；但最主要的，還是要根據本國的歷史性、地方性、民族性，從舊的方法裏面，改組成最新的最適合於國民習性和程度的方法，再參合世界同性的治國方式去應用。治英國的，不可忘英人的海上性；治美國的，不可忘美人的大陸性；治德國的，不可忘德人的森林性；治俄國的，不可忘俄人的農墾性；治法國的，不可忘法人的浪漫性；治日本的，不可忘日人的艱樸性。所以英日同爲君主立憲，而二國之憲法精神，絕不相同；法美同爲民主共和，而二國之國會性質，亦絕不相同。他不不同的地方，和不忘記的地方，便是他歷史性、地方性、民族性特別表現的地方。假使治理一個國家而可以置本國的特性於不顧，那沒，我們要立共和國，祇須把美國或法國的約法，全部抄下來，依樣畫葫蘆的做起來，使得又何以我中華民國建立共和政體以來，什麼總統制、總理制、國會制，以及中央集權制、聯省自治制，一樣一樣的全拿來試驗過了，不但說見不到效驗，反弄成四分五裂，兵匪相殘，成了一個愈弄愈糟的局面。再說進一步：在前清同光之間，那滿洲皇帝，也知道變法維新了。第一進步，立譯學館，立廣方言館。他認做外國人之所以強，全是能說外國話，能讀外國書的緣故；怪不得把全中國人個個弄成鸛舌頭都

說起外國話來，纔好。後來看看連吃了幾次敗仗，纔明白外國之所以強於中國的地方，不獨能說外國話，讀外國書，還有他的兵艦大砲來得利害。第二進步，便拿了許多金錢，去向德國買了許多兵船大砲來，編成極漂亮的海軍，練成極新式的陸軍，在自己海面上，自己國土上，大擺其架子。誰知銀錢蠟銷頭，從日本甲午一戰以後，殺一陣敗一陣，見一個怕一個。同時，打開了我四千年牢閉着的關門。第三進步，便講求通商。但像我們這班思想簡陋的工人，狡詭成性的商人，和他們資本雄厚科學發達的工商人相周旋，眼見得一天不如一天的失敗下來。從前自己誇張爲全世界唯一貿易的絲茶兩項，到如今不但操縱於外人之手，且以他們工商業的進步，幾全奪我絲茶商場之席。通國上下，此時不覺慌張起來，知道外人工商業之進步，全靠著科學。第四進步，我們中國人也居然大談其科學了。一面遣派留學生，一面建立各項工廠。但都是陽奉陰違的態度，留學生很多畢業回國的，也不肯好好的去用他。——留學生也很多有不肯好好的學好好的做——反叫他去投在外人的工場裏，幫着外人製造出貨品來，壓迫自己商人。至於仿造的洋貨，既貴而又不合用，還口口聲聲叫人提倡國貨，讓他去發洋財！這完全是用投機的態度，不信任的態度去嘗試這根深蒂固的新工商業，焉得而不失敗？左也弄不好，右也弄不好，第五進步，便漸漸的注意到政治問題上來了。派遣了許多的留學

生，到日本去學法政，國裏也立了許多法政傳習所。以謂要求國家富強，先要求政洽清明；這班法政學生回國來，恰恰做了革命黨的領袖，推翻了滿清專制政府，建設着共和國。聞得烏烟漲氣，十七年來，國既不能共，家也不能和。最近一時期，爲第六進步。自從五四運動以後，新文化盛行，橫生出許多主義來，以謂東西洋文化之精髓，不在形下之科學機械，而在形上之各種主義。如雷渥那德 Leonards da Vinci 的機械主義，盧梭 Rousseau 的返自然主義，尼采 Nietzsche 的超人主義，司丁 Max Stirner 的個人主意，託爾斯太 Tolstoy 的人道主義，達爾文 Darwin 的進化主義，佐拉 Emile Zola 的自然主義，菲洛洛奧格 Flaubert 的虛無主義，歐根 Eucken 的理想主義，柏格森 Bergson 的直觀主義，太谷爾 Tagore 的實現主義，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的大勇主義，詹姆士 William James 的實用主義等等，莫不風行一時。最後，又爲克魯泡特金 Kropotkin 或巴勃夫 Baboeuf 的共產主義，或爲試驗馬克斯 Marx 的科學的社會主義，或基爾特 Kierkegaard 社會主義，而大起紛擾。唉，主義啊，主義啊，你到底是要殺我們中國的呢？還是來救我們中國的？

實在說起來，要救國家，什麼方法，什麼主義，都行；要殺國家，什麼方法，什麼主義，都可以。祇看他運用方法採取主義的態度如何。你倘然能根據本國的歷史性，地方性，民族性，從舊的方法裏，整

理出來；改善他的弱點，利用他的優點，融合他的特點，因參合世界最新最適合的方法與主義，循步漸進的施行起來。那主義固可以救國，共和政治亦可以救國，科學固可以救國，船堅砲利亦可以救國。不然，捨己從人，藥石難投，如今日的中國，不知保全自己固有的文化，維護自己固有的精神，利用世界優良的制度，圖圖吞棗，依樣葫蘆，每一試驗，必遭失敗。不獨主義足以殺我，共和政體也能殺我；不獨科學能夠殺我，船堅砲利更足以殺我。不量個性，不顧胃力，祇知生吞活剝，雖珍錯蓂苓，亦能致病，況其功效未必等於珍錯蓂苓者耶？

但是要回頭研究我國的歷史性，地方性，民族性，和良好的制度，適合於現時代的學術思想主義；非依舊向我本有的六經國故學中去找尋不可。却是這裏有一句話，須先行聲明的：我所說的研究六經，研究國故學，決不是用那班自命爲學問家——讀書人——死抱住的態度去研究，也決不是用食而不化的方法去研究；更還須追求他是真正的六經，真正的國故學，而適用於救濟現代的，纔肯加以研究整理而實驗之。

說到此處，還須把話分開兩路來說：

第一路，追求他是否是真正的六經真正的國故學——便是不用死抱住的態度——說到這一句

話，便應當拿「盡信書不如無書」一句老話來做註脚。中國的陳腐屍骸，便是六經；中國的傳家至寶，也是六經。你固然不可以拿傳家至寶和陳腐屍骸一般埋葬在泥土裏，任他廢爛而不用；你也不可拿傳家至寶，僅僅和陳列骸骨一般，任他閉鎖在千年不見光明的古室裏，永永遠忘他。你須要寶愛這陳腐屍骸，你須要和寶愛傳家至寶的一般看重他；你看重你這傳家至寶，不僅僅和玩弄古董式一般的迷戀他而至於玩物喪志，你須用科學的方式去研究他，去利用他，去考察他過去的善，改造而求適用於現在。要從這傳家至寶裏，研究出過去的價值，而更增進其在現在之價值；我可以靠這傳家至寶，改進生活，增加學識，修善道德。總之一句話：我要使這傳家至寶，能應用改善現實的人生，使他成爲一個名副其實的「寶」字；不要使他成爲一個骸骨式的，骨董式的廢物。這個方法，第一步，須辨別是否是真實；第二步，要分晰他是否能適用於現在的寶——或一部分能適用或全體能適用——不能適用的，雖真也算不得是寶。

可憐我們中國的學者，他連第一步辨別寶的真假的工作，尙未完成，如何能講到應用中國書學的史學，的自然科學的文學的社會科學的種種寶貴的原素，全在周秦時期所產生的所謂六經，所謂諸子百家；以後二三千年的下來，所謂兩漢的大儒，唐宋大儒，明清大儒，他們一無發明。他們因爲

得了一部極豐富極寶貴的祖宗遺產，數千年下來，享之不窮，用之不絕；便也安富遵榮，不求進取，并且不圖保守，甘自墮落的過着日子。好好祖宗留傳給他的一部實用的器械，和使用這器械的方法理論等著作，祇因子孫限於智識，昧於見解，便把這實用的器械，拆卸得七零八落，拿他當骨董玩器一般的看待。不但不能改造這器械使他更精美，更合於實用，并且把這本適於實用的器械毀壞，成了廢物。至於那方法理論等著作，更因限於學力，有的拿他看做天書一般神妙，有的拿他看做字紙箋中的字紙一般的廢棄；總看沒有一個相當的價值來，總理解不出一個切實的效用來。他祖宗的遺產實在太豐富了，有許多堆積在倉庫裏的，有許多埋藏在地窖中的。做子孫的，祇聽得這傳家寶的名兒，究竟有多少數兒，是怎樣的一個形狀，他自有生以來，也不會親自去打開倉庫來實地點查過，也不會親自去掘開地窖來詳細考察過；莫說去拿出來研究他，使用他了。這樣一代一代的下去，幾千年後的子孫，祇知道向人誇說我祖宗遺傳下來地窖中倉庫中收藏着有無限若干的寶物，這寶物有多少數兒，是何形狀，有如何的效用，他一概不問；祇因他不會實地考察過，因之他的傳說愈說愈糊塗了，愈說愈神奇了。各人憑着自己的臆說，閉着眼睛瞎吹，把好好可以得大利成大業的寶物，可以實用於人生的機械，說成神奇怪誕，等虛妄物，同於廢物，豈不可嘆！

照前一段研究遺產的方法說，——便是把實用的器械拆卸得七零八落，拿他當骨董玩器一般看待的方法——便很像是漢儒的解經；照後一段研究遺產的方法說，——便是憑着自己的臆說說成神奇怪誕的方——便很像是宋儒的解經。這兩種方法，都搔不着癢處。漢儒去古尚近，但經過秦始皇一燒以後，他們所得的六經，有從傳說記錄下來的，有從破壁荒墟裏收拾得來的。傳說得來的，不免有錯誤假託之弊；破壁中得來的，更不免有虛偽離奇之病。便算是十分忠實的傳經，十分切實的解經，但照漢儒那種支離瑣碎的解法，不辨是非的傳法，不但是不足以闡明經意，且更使經意晦難，遺誤後學不淺。——如傳經一變而為讖緯之說，更是荒謬誤人——傳至唐宋，唐人以詞章視經，趨於文字之末；宋儒以理學解經，講「明心見性」之道，是以六經爲佛書註腳，望文生義，增字解經，不獨厚誣古人，且其解經，虛無怪誕，玄妙而不中於事理，可視爲佛性的儒學，與六經本旨毫不相干。直至明清用八股取士，三場祇取四書之文，因之學者除四書外，所謂經史，所謂諸子百家，俱束置不讀，除八股虛偽機械之文外，茫無所知。間有一二富貴餘暇，或文場失意的人，略讀古書，但斜陽修造，所得有幾？況此中大都藉以鳴高誇奇，或寄託牢愁，不免流於虛張怪僻之一途；其能以忠實態度銳利眼光研解六經者，有幾？

我如今說一句打聽兒話的中國學術文化的原素，在周秦時的六經與諸子百家之說；但經過數千年數百輩的儒者——以一學派一時期爲一輩——的傳說，不但不能使六經諸子的學術文化，神明發展而合於實用，且愈說愈荒謬，愈說怪僻，使這古義愈傳愈糊塗，反使外來的科學思想因無本國的歷史性地方性民族性與本國的文化特性爲之根據，同歸於失敗。這個並不是外國的科學制度害我，也不是外國的思想主義誤我；這正是我們自己不能神明發展本有的學術文化以與外來的科學思想相融會，而使之合於實用，反害了這科學的好制度，主義的好思想。一學術，一事業，倘若沒有相當的程度去承受他；非但學術事業無可進益，反足爲學術事業的障礙。所以要救現在的中國，果然非採取世界流行的科學制度學術主義不可；但要明白我們是用採取的手段，並不是用搬取的態度。採取，是分別部分的，採那一部分最適合於中國的，而使他與本有良好的文化學術結合，利用本國的特性，因勢而利導之，成一整個的中國文化，使之適合世界潮流而實現，而進展，而享受莫大之利益；搬取，是不明性質，不辨是非，盲從的，國圖吞棗式的，依樣葫蘆式的，把整個外國的學術制度搬來，抹殺本有一部分良好的文化學術，而一味模仿。其勢非根本推翻本國的歷史性，地方民族性，而唯外人之步趨是從不可。——恨不能把中國人也改造成藍眼珠高鼻子模樣——他

的結果，徒銷滅了本有良好的文化與特性，壓迫人民，紊亂社會，使國力愈退步，學識愈難雜；不獨得不到新的利益，且銷滅了舊的精粹。所以我們如今要享用新的利益，第一要着手整理出舊的精粹來，與新的溶化，纔能發生效力。那明清的制藝，果然不是我們的精粹；唐宋的詞章理學，亦不是我們的精粹；兩漢的識緯之說，訓詁之法，亦不是我們的精粹。他們本來沒有創造學術文化，他們祇有用割裂的虛偽的方法傳說他祖先傳下來最寶貴的遺產；這方法非但不能使我們做子孫的明瞭祖宗遺產的實況，更不能享用祖宗遺產的實利，使振興而與鄰人同等榮盛。所以我們欲真正得舊的精粹，須用擒賊擒王，撥雲見天的手段，淘沙得金的工夫，直溯本源，撇開漢宋諸儒支離虛妄的傳說，切切實實，從六經本文，諸子原理上整理分晰出一個頭緒來。先求了解，再求發展而使合於實用。

漢宋諸儒的解經，固然是中國根本學術文化的一大障礙；但揭去了這一層障礙，還有一層大障礙遮着，使我們永永見不到六經諸子的本色。這大障礙是兩個時期造成的：——秦始皇焚書坑儒的一大摧殘還不在內——第一個，是戰國游說的時期。那時游說之士，祇圖諸侯之信任，謀個人利祿的發展，不卹改造經文，託爲古說以動其主。——崔述說戰國秦漢以後所述則多難以權術詐謀之習與聖人不相類，無他彼固以當日風氣度之也。又說戰國之時說客辯士尤好借物以喻其意。

……毫無所因憑心自造又說大抵戰國……之書皆難徵信而其所記上古之事尤多荒謬然世之士以其流傳日久往往信以爲實其中豈無一二之實然要不可信者居多乃遂信其千百之必非謬其亦惑矣——後人以謂戰國時最近古當時所傳說的聖經賢傳必較後人爲真確便一味信任他崇拜他；恰恰我們都上了戰國游說士的老當不覺墜其詐謀的術中以誤傳誤而留六經之一大障礙於後世第二個是王莽假託的時期那時有劉歆欲迎合王莽篡位的心理以謀一己功利的發展便大膽改造古書說王莽篡位是合於古義的證明他「事必師古」的大義去哄騙天下的人心他所稱的古文周禮古文左傳大都是劉歆一人改造出來的偽書此外六經有不便於他篡奪的地方他便一一假造一一竄亂直至今日還不得見六經的真相更得不到六經的真實利益所以我們今日欲直求古人學術思想的精粹不但要推翻漢宋諸儒的解經方法更要推翻戰國王莽兩時期的假經這一類工作便稱做「辨僞」——傳家至寶果然值錢僞寶却不值錢反足以害真

要辨僞便須研究他僞的來源上面所說戰國游說王莽假託固然然是兩大來源此外的細流第一是託古他利用常人尊古的心理後人每有創說便假託古人以出之最顯著的如孔孟之託堯舜墨子之託大禹後人變本加厲專造一書以張其說第二是獻書圖利漢承秦皇焚書以後便廣徵

還書，令民間獻書；一般士人，因獻書可以謀利，或造作偽經，或增添篇幅，使真本益致偽亂。第三，是作偽爭名，如漢王肅因嫉鄭康成之成名，便百計偽撰古文尚書、孔子家語等，以求爭勝，并攻擊康成所託爲假，而自稱所託者爲真。因之而後人愈不能辨其真假。第四，是爲宗教家所假託，如道家欲侵迫佛家，假託古人之說而作道藏，倚古人以立門戶，而後世學者益覺渾亂莫辨。第五，是爲迎合社會心理而作偽。六經諸子的學術，傳至明季，學者漸苦漢儒的瑣碎，宋儒的空虛，便樹起「復古」的標識來，一時找不到正當的途徑，不知整理統系的方法，便有迎合社會心理的士人，造作古書以欺世。如楊慎、豐坊輩，而古書之源愈雜。此外如胡應麟所說的：「有憚於自名者，如魏泰筆談之類；有恥於自名者，如和氏香奩之類；有假重於人者，如子瞻杜解之類；有惡其人，僞以陷之者，如僧儒行化之類；有惡其人而僞以誣之者，如聖俞碧云之類；有竊成作而爲己有者，如化書本譚峭著，宋齊丘竊而序傳之之類。」都足以使後人迷惘失真。六經諸子偽書的來源，亦事同一例。

上面說的，是成就偽書的種種原因，以下我再說辨僞的方法。近人如胡適之中國哲學史中所說辨僞書的方法道：「凡審定真僞，須要有證據，方能使人心服。這種證據，大概可分爲五種：（一）史事。書中的史事，是否與作書的人的年代相符？如不相符，即可證那一書或那一篇是假的。（二）文字。

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字，不致亂用。作偽書的人，多不懂這個道理，故往往露出作偽的形迹來。（三）文體。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體，一個人也有一個人的文體；後人儘管仿古，古人決不仿今。（四）思想。凡能著書立說成一家言的人，他的思想學說，總有一個系統可尋，決不致有大相矛盾衝突之處。故看一部書裏的學說，是否能連絡貫穿，也可以幫助證明那書是否真的。大凡思想進化，有一定的次序；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問題，即有那個時代的思想。大凡一種重要的新學說發生以後，決不會完全沒有影響。（五）旁證。還有一些證據，是從別書裏尋出的，故名爲旁證。而梁啓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中也列有十二條鑑別偽書的公例：

一、其書前代從未著錄，或絕無人徵引，而忽然出現者，什有九皆偽。
二、其書雖前代有著錄，然久經散佚，乃忽有異本突出，篇數及內容等，與舊本完全不同者，什有九皆偽。

三、其書不闕有無舊本，但今本來歷不明者，即不可輕信。

四、其書流傳之緒，從他方面可以攷見，而因以證明今本題某人舊撰爲不確者。
五、其書原本經前人稱引，確有左證，而今本與之歧異者，則今本必偽。

六、其書題某人撰，而書中所載事蹟，在本人後者，則其書或全僞，或一部分僞。

七、其書雖真，然一部分經後人竄亂之蹟，既確鑿有據，則對於其書之全體，須慎加鑑別。

八、書中所言，確與事實相反者，則其書必僞。

九、兩書同載一事，絕對矛盾者，則必有一僞，或兩俱僞。

十、各時代之文體，蓋有天然界畫，多讀書者，自能知之。故後人僞作之書，有不必從字句求枝葉之反證，但一望文體，即能斷其僞者。

十一、各時代之社會狀態，吾儕據各方面之資料，總可以推見崖略；若某書中所言其時代之狀態，與情理相去懸絕者，即可斷爲僞。

十二、各時代之思想，其進化階段，自有一定。若某書中所表現之思想，與其時代不想銜接者，即可斷爲僞。

吾鄉曹聚仁又衍胡梁二君之意，分爲從人事辨僞方法，從時代辨僞方法，從思想辨僞方法，從旁證辨僞方法四種；而從人事辨僞，則又分爲：一、從著錄傳授上檢查。因古書流傳，各有系統，各史經籍志各有記載，若其書突現，必有可疑。如古三墳晉乘楚檣杌，一見於左傳孟子而外，古人所從未稱

引隋元和時，忽現此書，其僞必矣。此爲一例。如東晉古文尚書與漢書藝文志所載篇數，及他書所載篇名不同，故知非原本。爲又一例。如毛詩序，史記漢書兩儒林傳，漢書藝文志，皆未言及，故可決爲西漢前所無。此又一例。如隋書經籍志，明言魯詩亡，明末忽出現申培詩說，必僞無疑。此又一例。二，從文字一裁上檢查。卽胡說：「一時代有時代的文字。」若一經作僞，其文體卽截然不同，頗易檢查。如黃帝素問，長篇大段的講醫理，不獨三代以前無此文章，卽春秋間亦無此體。用論語老子等書，便可作反證，故此書必爲僞託。是一例。如尚書二十八篇，佶屈聱牙，而古文尚書二十五篇，文從字順，什九用偶句，全屬晉人文體。不獨非三代前，並非漢以前所用。又是一例。如現行關尹子，全屬唐人翻譯佛經文體，不獨非與老聃同時之關尹所能作，又不獨非劉歆校定七略時人所能作，乃至非六朝以前人所能作。又是一例。三，從事蹟制度上檢查。凡書籍中所引證的事實，必是後人徵引前人的，決沒有前人徵引後人。若書中所引前後倒置，必僞無疑。如管子記毛嬙西施，商君育記長平之役，此管商二人所必不能見之事，可證此二書必非管商二人所作。是一例。如月令有「太尉」官名，可知非周公所作。又是一例。如山海經有漢郡縣名，可見決非伯益所著。又是一例。如易林引左傳，左傳東漢始傳布，可知決非西漢焦延壽所著。又是一例。從時代辨僞，則亦分爲二：從時代背景上檢查。一時代思想學術

之產生，必附帶有此時代之色彩；換言之，因受時代環境之逼迫，而產生此適應時代之思想與學術。故一種記錄思想學術之書籍，決不能與當時此地之時代背景脫離，或勃認。若有突離時代背景之思想，必不可靠。如管仲時，都市未發達，經濟集中現狀未成，決不能產生如管子中之經濟思想，故其書必僞。二、從進化程序上檢查。因思想之進化，有一定程序，若某書與進化程序不合，必僞無疑。如管子一書，於老子之前，忽然有心術、白心、諸篇那樣詳細的道家學說；孟子、荀子之前，忽然有內業那樣深密的儒家心理學；法家之前數百年，忽然有法法明法禁藏諸篇那樣發展的法治主義；皆與進化程序不合，故其書必僞。是一例。從思想上辨僞，則又分爲一、從作者根本主張上檢查。這便是胡說凡能著書立說成一家言的人，他的思想學說，總有一個系統可尋，決不致有大相矛盾之處。今若有矛盾，即必有一僞。如韓非子第一篇勸秦，王攻韓，第二篇勸秦，王存韓，兩相矛盾，故知第一篇必僞。是一例。如近人輯黃梨洲遺著，內有鄭成功傳一書，稱清兵爲大兵，指鄭氏爲畔道，與梨洲思想根本不相容，故知其必誤。是又一例。二、從思想淵源上檢查。每派思想之出發點必有其宗主；若某書亂其淵源，則必是僞書。如管子有嚴兼、愛嚴、寢兵之說，彼時墨翟、宋鉞未生，何由生此問題？故知必僞。是一例。如列子有「西方之聖人」等語，其中與佛教教理相同者甚多，故知決非莊子以前之列禦寇所作。是又